

# 2011 年臺灣史研究回顧與展望：經濟史

洪紹洋\*

- 一、前言
- 二、各論介紹
- 三、結論

## 一、前言

根據《臺灣史文獻類目 2011 年度》的經濟史之研究成果，依據性質可進一步分為經濟政策與制度、產業史、產業與家族、商業活動、科技與交通、貨幣與金融六大類。

然而，因收錄文章數相當豐富，而作者本身學力有限，無法逐篇進行詳盡之解析。在此前提下，本稿擬就專書與期刊論文給予較多評析，研究生論文則偏重介紹。又，數篇文章因收錄在論文集，以及若干碩士論文不易搜尋，故未在正文中進行討論。

## 二、各論介紹

### (一) 產業史

林玉茹《國策會社與殖民地邊區的改造——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東臺灣的經營(1937-1945)》一書，分析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東臺灣的經營機制，並兼論農林、移民、投資事業之發展。作者提出戰時臺灣總督府在以國策資源為考量下，選擇於殖民邊區的東臺灣建立軍需產業，並將當地的熱帶栽培經驗複製至華南和南洋。作者近十年來投入許多精力對東臺灣與拓殖事業進行深入研究，本書可說集其研究之大成，以產業史與企業史的觀點對國策會社如何在特地區域開發進行討論。<sup>1</sup>

林蘭芳《工業化的推手——日治時期臺灣的電力事業》，為博士論文改寫出版之專

---

\*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sup>1</sup> 林玉茹，《國策會社與殖民地邊區的改造：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東臺灣的經營(1937-1945)》，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1。

著，並著重對日治時期臺灣電力事業的發展進行討論。該書說明戰前臺灣的電力事業最初以分區的方式由官營或民營各自經辦，最終統一為臺灣電力株式會社之過程。作者嘗試由產業史、經營史、科技史的角度探索臺灣電力事業的發展，除關注電力事業的整合外，還提及到電力如何帶動產業發展與改變臺灣的工業結構。<sup>2</sup>

近年來在日本與臺灣兩地共出版三本研究臺灣電力事業的專書。2004 年北波道子出版的《後兇工業国の經濟発展と電力事業》(京都：晃洋書房，2004)的專著中，對戰前、戰後臺灣電力事業的發展進行整體性考察，並以開發經濟學的觀點反駁過去論著提出的國民黨政權「由上而下」的開發體制，強調臺灣民間資本「由下而上」的重要性。湊照宏《近代臺灣の電力産業—植民地工業化と資本市場》(東京：御茶の水書房，2011)一書，則是偏重以資金的觀點來看臺灣電力事業的開發。由於電力事業的開發需要長期且大量的資金投資，故湊照宏著重於臺灣電力事業的資金籌措與營運上的收益。<sup>3</sup> 綜言之，以上三本論著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分析臺灣的電力事業發展，可說各有長處。

洪紹洋《臺灣造船業的技術移轉與學習》，著重以二次大戰前、後臺灣造船業的發展作一整體而連續性的討論，並對戰後初期臺灣造船公司如何填補日本籍技術人員離開後所產生的管理與技術缺口進行研究。此外，也就各時期的技術學習、技術者的養成與政府的產業政策進行論述。<sup>4</sup>

彭琪庭《香港僑資與臺灣紡織業(1951-1965)》，以外國資本投資紡織業中，件數和金額最多的香港僑資為考察對象。研究結果發現，來臺的香港僑資中約八成比例投資集中在技術與資本密集度較低的織布業、成衣業和帽襪業。此外，與香港華僑合作的國內業主多為國共內戰遷移到臺港兩地的商人，多運用港臺兩地的商人網絡拓展投資活動。又，華僑常利用投資名義進口當時管制或禁止進口類物資獲利。<sup>5</sup> 不過，早期在國共對立的背景下，香港為臺灣的重要情報站之一。實際上，部分以投資名義設立的僑資，均擔任政府對外情報聯繫的窗口。在此背景之下，或許不能純粹的以經濟動機來看早期的華僑投資，可進一步從政治與情報體系之層面進行剖析。

劉芳瑜《海軍與臺灣沉船打撈事業》，運用國防部檔案探討海軍在左營與澎湖所進行的沉船打撈。戰後海軍採取軍民合作的方式打撈沉船、疏浚港口，恢復臺灣的連外航運。在經濟效益上，海軍修理破壞狀況較小的沉船，解決當時船隻不足的問題。此外，政府還以打撈技術作為外交手段，前往東南亞協助打撈，以維繫與友邦之關係。過去對於戰後臺灣產業的發展，多將焦點著重在公營和民營事業上，往往忽略軍方與產業發展的關聯性。實際上，早期許多事業的興辦均可見到軍方人員的身影。作者以海軍參與沉船打撈事業之案例，不僅填補研究史的空缺，也開啟了新的研究範疇。<sup>6</sup>

<sup>2</sup> 林蘭芳，《工業化的推手-日治時期臺灣的電力事業》(臺北：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11)。

<sup>3</sup> 林蘭芳，《工業化的推手-日治時期臺灣的電力事業》(臺北：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11)。

<sup>4</sup> 洪紹洋，《近代臺灣造船業的技術轉移與學習》，臺北：遠流，2011。

<sup>5</sup> 彭琪庭，《香港僑資與臺灣紡織業(1951-1965)》(臺北：國史館，2011)。

<sup>6</sup> 劉芳瑜，《海軍與臺灣沉船打撈事業(1945-1972)》(臺北：國史館，2011)。

林玉萍《臺灣航空工業史：戰爭羽翼下的1935年-1979年》，利用口述訪談，配合戰後接收檔案等資料，試圖對臺灣航空工業進行研究。然而，因文獻資料無太大突破，口訪數量也受到限制，故論點值得再商榷。例如訪問的臺灣籍工員因層級過低，所處層級無法參與該航空工廠的實際營運及決策，口述記憶與經驗過於片面及零碎，內容僅止於描述工員生活。因此，作者在論述上或有擴大解釋之虞。<sup>7</sup>

高淑媛〈戰後初期技術累積與臺灣工業化——以省營化學工業為例〉一文中，對戰後初期率先完成民營化的省營化學工業之發展進行討論。作者認為，臺灣籍技術人才是否能妥善運用日治時期留下來的設備，以及取得原料生產具市場競爭力之商品，才是戰後臺灣工業化發展與否的主要關鍵。技術人才憑藉日本留下的設備，獲得發揮才能的機會，因而塑造出戰後臺灣的工業化社會。<sup>8</sup>

洪紹洋〈戰時體制下臺灣機械工業的發展〉，對1930年代至日本戰敗前先後設立的機械業會社進行考察，以瞭解這些會社如何與臺灣工業化發展及軍事侵略相行配合。結果發現，臺灣在缺乏原料、技術人員，以及整體技術能力尚未成熟下，多項建設仍滯留在發展雛形階段。<sup>9</sup>

蔡承豪〈臺產黑土：晚清臺灣罌粟栽植與鴉片自產之嘗試〉，探討自19世紀末以來，栽種範圍遍布臺灣南北部，成為當時新興作物的罌粟，對臺灣帶來什麼影響。自罌粟在臺灣栽種後，臺灣由罌粟的消費地躍升為產地，並將罌粟外銷。作者在文中對當時罌粟的栽培區域、品種、採收、產量與品質、銷售等面向進行分析，也對臺灣清廷官員對罌粟種植表達之意見進行探討。<sup>10</sup>

王文裕〈《豐年》雜誌與臺灣戰後初期的農業推廣（1951-1954）〉，探討《豐年》雜誌如何對臺灣農業發展帶來影響，並具體地以吳郭魚養殖為例，瞭解新品種與技術如何深植至民間。<sup>11</sup>

陳景峰〈日治臺灣配銷型態下的電影市場〉，嘗試以倒敘的方式回答為何戰後初期臺灣不存在電影片產製的能力，但電影市場卻十分蓬勃的問題。作者指出，日治時期臺灣的電影產業並無製作能力，僅有電影消費習慣的市場，主因在於臺灣總督府認為臺灣人若能製作發行電影，將使電影作為宣傳教化民眾的工作受阻。也就是說，當時臺灣總督府與日本內地商人合作，將電影作為宣傳工具，促使臺灣民眾在電影消費中達到政令宣傳效果。臺灣總督府與日商不斷通過戲院改良與宣傳鼓勵的方式，促進電影消費與教化功能，甚至在戰爭時期成為宣傳國策的工具。<sup>12</sup>

<sup>7</sup> 林玉萍，《臺灣航空工業史：戰爭羽翼下的1935年-1979年》，臺北：新銳文創，2011。

<sup>8</sup> 高淑媛，〈戰後初期技術累積與臺灣工業化——以省營化學工業為例〉，《臺灣史學雜誌》11，2011，頁92-108。

<sup>9</sup> 洪紹洋，〈戰時體制下臺灣機械工業的發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整理組編，《第六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1，頁31-56。

<sup>10</sup> 蔡承豪，〈臺產黑土：晚清臺灣罌粟栽植與鴉片自產之嘗試〉，川島松、松永正義、陳翠蓮編，《跨越青年學者臺灣史研究第四集》，臺北：稻鄉出版社，2011，頁211-266。

<sup>11</sup> 王文裕，〈《豐年》雜誌與臺灣戰後初期的農業推廣（1951-1954）〉，《高雄師大學報·人文與藝術類》，30（2011.6），頁1-22。

<sup>12</sup> 陳景峰，〈日治臺灣配銷型態下的電影市場〉，〈日治臺灣配銷型態下的電影市場〉，《臺灣學誌》，4（2011.10），頁45-63。

黃素真〈由地方現存史料談清代大坪頂(鹿谷鄉)的茶葉發展〉,運用田野調查蒐集之古文書,探索清代大坪頂茶農如何以經營茶園開始,在進行資本積累後才承接其他墾民墾熟之田園,顯現出當地農業具有相當程度的經濟性格。此外,作者分析大坪頂因位居交通區位劣勢,未能在清朝成為國際茶葉貿易分工的一環。由此亦顯現出臺灣島內交通和流通業的發達與否,將影響到一地的商品化水準。<sup>13</sup>

鄭志鵬〈攘外必先安內:產業公會與臺灣鞋業治理結構形成的歷史分析〉,有別於過去探討臺灣產業發展與國際競爭力時,多強調低價格策略或由政府主導的產業政策的重要性。作者從組織的角度出發,認為臺灣製鞋工業同業公主導政策制訂,穩定了島內市場的生產環境。且透過政策之推行,促使臺灣廠商在對外接單過程,不致因相互的削價競爭而讓國外廠商獲利,對臺灣成為世界製鞋王國所起的關鍵作用。<sup>14</sup>

林哲安〈荳莢花開落地生:花生與清季臺灣漢人社會的經濟活動〉,探討自荷蘭時代傳入臺灣的落花生,如何從純粹提供食用、維持地力的作物,到清末成為重要的經濟物產。作者認為花生在漢人社會中的利用價值不斷被開發,使其經濟效益隨之提高,主要是由於漢人移民不斷嘗試多元運用之故。<sup>15</sup>

謝明如〈日治時期臺灣烏魚子產業初探〉,探討日治時期臺灣烏魚子之製造改良事業、生產、運銷與獲利,使其品質獲得改善,產量亦日漸增加。<sup>16</sup>然而,在對烏魚子價格進行探討時,應可將名目價格轉換成實質價格,或可更為精確。另外,也可與同時期同類性質水產品價格相比,更能突顯出烏魚子的重要性。

杜建德〈清末臺灣的樟腦事業〉對昔日清末臺灣三大出口品之一樟腦進行討論,指出臺灣的樟腦具有稀少、壟斷和不可取代性的三大特性。<sup>17</sup>

張柏琳〈戰後初期臺灣鹽政的重組與變遷(1945-1951年)〉,就臺灣鹽制從日治時期的專賣制度,到戰後初期鹽政的暫行專賣制、民間和公營經營的制度轉換進行討論。結果發現,臺灣鹽業制度於戰後初期曾短暫延續專賣制,之後便改為與中國鹽制一致之徵稅制,為臺灣鹽業與其他公營企業不同之處。<sup>18</sup>

柯宣帆〈日治時期臺灣的私鹽問題與鹽民生活〉,以日治時期臺灣食鹽專賣為研究對象,並針對私鹽問題與鹽民生活作主要探討。<sup>19</sup>

莊天賜〈臨時臺灣糖務局與臺灣新製糖業之發展(1902-1911)〉,主要運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對糖務局任職之專兼任技師進行人事分析,結論發現糖務局的專兼任技師帶有濃厚的北海道色彩,專長偏重農學,絕大多數受過近代農、工高等教

<sup>13</sup> 黃素真,〈由地方現存史料談清代大坪頂(鹿谷鄉)的茶業發展〉,《臺灣文獻》,62:2(2011.6),頁145-180。

<sup>14</sup> 鄭志鵬,〈攘外必先安內:產業公會與臺灣鞋業治理結構形成的歷史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3:1(2011.3),頁15-60。

<sup>15</sup> 林哲安,〈荳莢花開落地生:花生與清季臺灣漢人社會的經濟活動〉,《臺灣文獻》,62:1(2011.3),頁183-232。

<sup>16</sup> 謝明如,〈日治時期臺灣烏魚子產業初探〉,《臺北文獻》,175(2011.3),頁181-201。

<sup>17</sup> 杜建德,〈清末臺灣的樟腦事業〉,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sup>18</sup> 張柏琳,〈戰後初期臺灣鹽政的重組與變遷(1945-1951年)〉,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1。

<sup>19</sup> 柯宣帆,〈日治時期臺灣的私鹽問題與鹽民生活〉,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碩士論文,2011。

育，可說是適才適所。其後，糖務局之技師陸續轉任製糖會社。<sup>20</sup>

林劭宇〈凍頂烏龍茶發展史之研究〉，對凍頂烏龍茶的起源、栽植環境，以及如何藉由舉辦比賽助長栽植高品質茶葉之風氣進行說明。此外，也對當地茶葉文化與活動的推廣進行介紹。<sup>21</sup>

吳柏勳〈美援與臺灣遠洋漁業之發展(1951-1965)〉，處理政府利用美援發展漁業之過程。最初美援資金的運用原則，希望政府勿介入過多，而以輔助民間企業發展為主。但因遠洋漁業所需資金龐大，非民間企業可獨力負擔。所以政府制定〈350噸級鮪釣漁船計畫〉，由公營之中國漁業股份有限公司作示範作業，藉此吸引民間的投資，以符合美援的精神，但其中衍生出各項新問題。<sup>22</sup>

## (二) 家族與產業

2011年8月23-24日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舉辦「臺灣五大家族學術研討會」中，與會者發表不少探討家族與經濟、經營、商業網絡關係的論文，並經審查後收錄於臺灣文獻特刊。

在基隆顏家部分，陳慈玉〈日治時期顏家的產業與婚姻網絡〉一文，介紹顏家如何在日本治臺初期以調解日軍與當地民眾間的紛爭為起點，其後進一步參與金礦、煤礦、交通運輸業等近代化事業。另外，顏家還藉由創設基隆博愛團，成為殖民地政府和當地民間社會的聯繫橋樑。<sup>23</sup> 又，顏義芳〈基隆顏家與臺灣礦業開發〉，探索基隆顏家四代如何以採礦作為事業發展的起點，其後再承包藤田組的事業進行資本積累，逐步邁向多角化經營的投資。<sup>24</sup>

黃天才〈辜振甫與臺灣土地改革〉，說明辜振甫如何配合政府推動土地改革，並討論辜氏籌畫接手臺泥公司，為工礦、農林、臺紙四大公司民營化作了良好的示範與帶頭作用。此外，作者強調實施土地改革改善了農民生活，<sup>25</sup> 然而，土地改革政策的實施，卻使臺灣農業最終勢向耕地零細化一途，無法轉型為粗放農業，達到規模經濟的經營。此外，辜家經營的水泥事業屬寡佔市場，與其餘三間公司經營項目多屬非獨佔性有所不同，或許亦為民營化之後各公司經營績效出現差異的原因之一。

張守真〈「橫濱順和棧」產權轉承問題探討〉，運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探討高雄陳福謙後代家族與陳中和如何在陳福謙過世後將橫濱順和棧產權進行移轉。<sup>26</sup> 王御風〈陳中和家族與日治高雄市產業的發展〉，嘗試對陳中和經營的事業進行分期

<sup>20</sup> 莊天賜，〈臨時臺灣糖務局與臺灣新製糖業之發展(1902-191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1。

<sup>21</sup> 林劭宇，〈凍頂烏龍茶發展史之研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sup>22</sup> 吳柏勳，〈美援與臺灣遠洋漁業之發展(1951-1965)〉，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sup>23</sup> 陳慈玉，〈日治時期顏家的產業與婚姻網絡〉，《臺灣文獻》，18：4（2011.12），頁1-54。

<sup>24</sup> 顏義芳，〈基隆顏家與臺灣礦業開發〉，《臺灣文獻》，18：4（2011.12），頁105-130。

<sup>25</sup> 黃天才，〈辜振甫與臺灣土地改革〉，《臺灣文獻》，18：4（2011.12），頁347-366。

<sup>26</sup> 張守真，〈「橫濱順和棧」產權轉承問題探討〉，《臺灣文獻》，18：4（2011.12），頁367-392。

討論。<sup>27</sup> 文中指出，陳家以傳統製糖、製鹽、碾米進行資本積累，面對產業變化時受限政府將大型工業交由財閥主導，本身似乎無意應變。又，作者還論及 1930 年代以後臺灣總督府並未給予臺商插手大型軍需產業的空間，加上陳中和家族對此並不擅長，使得家族投資日漸減少。就此點而言，作者或許應從戰時體制實施的架構下進行分析，才能得出較為精確的結論。

趙祐志〈日治時期高雄陳家的資本網絡分析：以企業經營與投資為中心〉，除介紹陳家成員經營與投資的企業外，並著重對陳家的資本網絡關係提供說明。結論指出，陳家的分產過程符合華人的分產習慣，在諸子折產繼承下易造成家族資產的分散。高雄陳家相對於其他四大家族相較，資本網絡顯得較為保守與孤立，成為日後高雄陳家「新興製糖」、「烏樹林製鹽」相繼被併吞的主因。<sup>28</sup>

眾所皆知，家族的崛起與經濟實力的積累密切相關。近年對家族史與產業發展的研究因欠缺新史料的出土，故研究取向偏重由各面向對家族經營進行論述。但在剖析經營決策時，若將討論方式放在層次較低的家族經營，而欠缺較宏觀的地域經濟、國家經濟觀點，可能會對家族企業活動行為產生偏誤之見解。

### （三）商業活動

過去的研究通說，普遍認為 19 世紀中葉臺灣開港的米穀出口數額大減，出口大宗由清朝初年的米糖，轉變為茶糖樟腦，強調開港前後臺灣貿易體制的劇烈轉變。林文凱〈再論晚清臺灣開港後的米穀輸出問題〉認為晚清臺灣米穀主要由各條約港與非條約港的中式帆船運輸出口，並不在當時僅以條約港西式船舶為管理對象的海關統計範圍中，故清代海關資料並無法充分體現晚清臺灣的米穀出口實況。為此，作者運用日治時期的資料重新推估晚清臺灣米穀輸出量，證明臺灣米仍為重要的出口品。再進一步提出米的出口雖呈現遞減趨勢，但輸出總值仍高於茶和糖，確認米穀仍為晚清臺灣出口最大商品。最後，作者提出開港後臺灣經濟體制雖有重大改變，但原有之貿易商品、航運和銷售體制，仍具相當程度的延續性。<sup>29</sup>

趙祐志〈草根崛起——臺北商工協會的發展(1933-1939)〉，對 1933 年創設的臺北商工協會進行介紹，並對其如何發展新式宣傳方式，開創商業促銷手法。另外，作者尚探討該組織如何藉由集體力量，向大會社與殖民地政府爭取權益。然而，作者指陳的「夏季納涼」和「歲末廉賣」，似為日本銷售手法的移植。再者，行文中尚可進一步對該協會是否促成成員間的合作投資，或物流往來關係進行討論。<sup>30</sup>

張志源〈殼牌在淡水(1894-1910):淡水殼牌運輸貿易會社、拉派克·嘉士會社、三毛路會社石油倉庫土地產權、棧橋興建、業務經營之探討〉，先針對不同時期的土

<sup>27</sup> 王御風，〈陳中和家族與日治高雄市產業的發展〉，《臺灣文獻》，18：4（2011.12），頁 393-415。

<sup>28</sup> 趙祐志，〈草根崛起：臺北商工協會的發展（1933-1939）〉，《臺北文獻》，178（2011.12），頁 83-117。

<sup>29</sup> 林文凱，〈再論晚清臺灣開港後的米穀輸出問題〉，《新史學》22:2，頁 215-252。

<sup>30</sup> 趙祐志，〈草根崛起：臺北商工協會的發展（1933-1939）〉，《臺北文獻》，178（2011.12），頁 83-117。

地產權進行討論。其次，再論述倉庫區位與港灣問題。最後，說明三間公司的代理狀況進行說明。<sup>31</sup>

范雅鈞〈南興公司的設立及其經營層探析〉一文，探討 1938 年創設的南興公司，如何在臺灣總督府專賣局的技術與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的資金結合之下設立。作者分析該公司之設立背景、董監事經營層面、背後代表的勢力團體，由董監事經營層面中，發現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參與的程度頗深。當人事安排出現爭議時，多服從臺灣總督府的最終裁示，體現出戰時體制與日本向外侵略時的獨裁性格。<sup>32</sup>

過去臺灣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外來投資可說是為臺灣本地引進資金與技術。然而，伴隨臺灣經濟發展水準的提升，環境保護議題也逐漸受到重視。李巧雯〈臺灣省議會對外資在臺設廠之折衝〉，以杜邦和拜爾兩家外資前來設廠之過程，分析省議會如何反映地方民意，而其中顯現出中央政府與地方民意機關因著眼點不同，存在著利益衝突的問題。簡言之，中央政府欲在地方推動外來投資時，要如何在兼顧環境保護下，促使當地民眾接受。而臺灣省議會作為地方民眾與中央政府的中介者，卻因受到民意制約，選擇了與民眾站在一起，將民意反應給中央政府，反倒無法成為中央政府與民眾間的溝通橋樑，這也成為外資來臺的不利因素。

李佩蓁〈安平口岸的華洋商人及其合作關係——以買辦制度為中心（1865-1900）〉，聚焦清朝和日治初期安平口岸華洋商的互動關係。值得矚目的是，1895 年進入安平的日本商人，為進佔安平口岸市場，也不得不與華商配合，重回以買辦制度為中心的合作關係。此舉顯現出安平口岸華商既有強固的勢力，無論面對洋商或日商都展現極強的耐受性。<sup>33</sup>

翁如珊〈清末臺灣洋貨的進口與消費〉，挑選出貼近一般庶民生活可能常見與消費的洋貨，試圖從生活中不同面向切入，探求洋貨在清末臺灣庶民生活上產生的影響與消費差異。<sup>34</sup>

江篤勳〈Vespa 在臺灣的興衰(1958~2002)〉，探討義大利偉士牌機車先以代理的方式進入臺灣機車市場，之後因政府對機車實施進口替代政策，促使 Vespa 在 1967 年開始於臺灣設廠生產，至 1980 年以前幾乎佔有幾乎全部的速克達市場。之後因銷售策略的保守，使其在經營上逐漸失去競爭力，最終在 2002 年完全退出臺灣市場。<sup>35</sup>

李勁樺〈土洋大戰：清代開港後臺灣的紡織品貿易〉，探討開港後的臺灣，在來的土布與外來的洋布之競爭。作者發現，北部市場受惠於茶產業的持續擴張，經濟能力提升，對於紡織品的需求量也不斷攀升。南部市場則受到糖業出口衰退的拖累，使得當地進口紡織品貿易陷入停滯；又，當地商人亦加入經營洋布貿易，洋商在無

<sup>31</sup> 張志源，〈殼牌在淡水（1894-1910）：淡水殼牌運輸貿易會社、拉派克、嘉士會社、三毛路會社石油倉庫土地產權、棧橋興建、業務經營之探討〉，《臺北文獻》，178（2011.12），頁 119-158。

<sup>32</sup> 范雅鈞，〈南興公司的設立及其經營層探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整理組編，《第六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1，頁 185-210。

<sup>33</sup> 李佩蓁，〈安平口岸的華洋商人及其合作關係——以買辦制度為中心（1865-1900）〉，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1。

<sup>34</sup> 翁如珊，〈清末臺灣洋貨的進口與消費〉，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1。

<sup>35</sup> 江篤勳，〈Vespa 在臺灣的興衰(1958~2002)〉，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1。

利可圖下放棄南部市場。<sup>36</sup>

李恩廷〈日治時期臺灣自動車營業組合之發展及其運作(1912-1945)〉，探討同業團體活動下的自動車業態發展情形。研究結果發現，由於自動車業本身特有的公共性，故其同業團體在各項事務與活動等方面，始終都與官方管理者保持密切關係。<sup>37</sup>

巫旻樺〈百年糕餅產業成長歷程之研究：以舊振南餅店為例〉，分外部與內部因素對舊振南餅店的經營進行分析，最後再以全臺六家百年糕餅店進行比較分析。<sup>38</sup>

## (四)經濟政策與制度

### 1.專賣制度

蕭明治〈日治時期臺灣菸酒專賣之經銷制度〉，探討專賣下的經銷制度，分別對制度沿革、相關規定、收支情形進行分析。作者結論提出，菸酒專賣延續歷早期鴉片與食鹽專賣經銷方式，透過全臺各地經銷商轉賣，除了籠絡地方人士外，尚可擴大銷售層面。在銷售上除由經銷商獨自銷售外，還需配銷、巡視境內所屬的零售商。<sup>39</sup>

顏義芳〈臺灣酒專賣令施行脈絡形成之探討〉一文，在臺灣總督府的統治構造下，探討酒專賣的動機與實施方法。<sup>40</sup> 而栗原純〈臺灣總督府的阿片專賣政策：明治三四年の扶鸞「降筆會」運動の意味するもの（臺灣總督府的鴉片專賣政策：明治三十四年扶鸞「降筆會」運動的意涵〉，著重於探討民間信仰組織「降筆會」如何對臺灣總督府販售鴉片之財政帶來衝擊。<sup>41</sup>

岩村益典〈1933年以前酒類專賣與啤酒〉，對當時啤酒為何不列入1922年的專賣對象，以及當時的專賣與市場進行論述。作者指出，現金交易制度使得酒類的商業市場失去週轉彈性。<sup>42</sup>

### 2.土地問題

葉淑貞〈日治時期地租高低的決定因素〉，指出過去一般人認為地租過高，主要是地主剝削所造成，但未對此一論點進行分析。葉淑貞整理統計資料數據，歸納出

<sup>36</sup> 李勁樺，〈土洋大戰：清代開港後臺灣的紡織品貿易〉，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sup>37</sup> 李恩廷，〈日治時期臺灣自動車營業組合之發展及其運作(1912-1945)〉，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1。

<sup>38</sup> 巫旻樺，〈百年糕餅產業成長歷程之研究：以舊振南餅店為例〉，國立高雄餐旅大學臺灣飲食文化產業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sup>39</sup> 蕭明治，〈日治時期臺灣菸酒專賣之經銷制度〉，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整理組編，《第六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1，頁211-238。

<sup>40</sup> 顏義芳，〈臺灣酒專賣令施行脈絡形成之探討〉，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整理組編，《第六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1，頁57-78。

<sup>41</sup> 栗原純，〈臺灣總督府的阿片專賣政策：明治三四年の扶鸞「降筆會」運動の意味するもの（臺灣總督府的鴉片專賣政策：明治三十四年扶鸞「降筆會」運動的意涵〉，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整理組編，《第六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1，頁79-184。

<sup>42</sup> 岩村益典，〈1933年以前酒類專賣與啤酒〉，《臺北文獻》，177（2011.9），頁235-255。



影響地租最重要的因素是地價，其次為收穫量。再者，地主對地租的決定力量可能大過佃農，但這不是影響地租的重要因素。製糖會社承租地的大小對地租雖有影響，但並不大。<sup>43</sup>

林文凱〈「業憑契管」？：清代臺灣土地業主權與訴訟文化的分析〉，先從制度面說明清代臺灣官方與民間兩類土地業主權維護體制的歷史內涵與運作的侷限性。其次，再對淡新檔案中 40 個控管文書內容，說明人民如何運用訴訟制度維護本身的土地業主權。結論發現，清代官員面對土地爭界案件時，未必會依照業憑契管的原則仲裁。反倒是基於地方治理穩定的整體考量，表達與實效考量的二元性，合法化不具合法管業契權，但已實際管業者的業主權。<sup>44</sup>

陳兆勇〈土地改革與政權鞏固：戰後臺灣土地政策變革過程中的國家、地主與農民(1945-1953)〉，從國家、地主與農民三個集體行動者的互動過程來解釋戰後初期臺灣的土地改革。行動者的抉擇受其擁有的權力以及既存的歷史社會條件之限制。行動者的利益考量和權力大小則與其所處的社會結構位置息息相關。其中，國家是最有權力的行動者，其決策考量對土地政策的發展影響甚大。研究發現，國府將土地改革當作策略性工具，用以解決戰後初期（1945-1953 年）所遭遇的統治難題。依據國府施政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這段土地改革史可以用 1950 年的過渡期為界，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從戰後到 1949 年底，問題重心在從臺灣汲取糧食以供應軍糧公糧。1950 年底起，國民黨的黨員徵收和組織發展策略也反映土地政策變革的策略用意作出相應的調整。後期土地政策的變革深受選舉開辦後政治局勢的衝擊，土地政策反過來也影響了後續臺灣地方政治的發展。<sup>45</sup>

### 3. 人口問題

徐茂炫、李佳振〈臺北市各區人口密度一甲子及其經濟發展涵義〉，嘗試對臺北市各行政區的演變進行說明，兼論各區人口密度之變化。然而，或許受限於使用資料過於單一，作者並未對戰後日本人的遣返、1949 年底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兩點造成的人口變化進行討論。<sup>46</sup>

張孟珠、楊文山、莊英章〈日治時期新竹地區妾婚現象的歷史人口學分析〉一文，以文獻史料和歷史人口學的研究方法，對清末至日治時期竹北、北埔、峨眉等新竹地區妾婚現象進行分析，討論妾婚的成因與目的、妾的生育與處境、在夫家居留時間的關係。結論發現童養媳的「小婚」婚姻下丈夫的納妾比率最高。但從新竹地區的統計資料來看，生子傳嗣並非納妾得唯一考量，亦有未曾生育卻得以久留夫

<sup>43</sup> 葉淑貞，〈日治時代地租高低的決定因素〉，《臺灣銀行季刊》，62：2（2011.6），頁 215-254。

<sup>44</sup> 林文凱，〈「業憑契管」？：清代臺灣土地業主權與訴訟文化的分析〉，《臺灣史研究》，18：2（2011.6），頁 1-52。

<sup>45</sup> 陳兆勇，〈土地改革與政權鞏固：戰後臺灣土地政策變革過程中的國家、地主與農民(1945-1953)〉，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1。

<sup>46</sup> 徐茂炫、李佳振，〈臺北市各區人口密度一甲子及其經濟發展涵義〉，《臺北文獻》，176(2011.6)，頁 117-162。

家的妾。<sup>47</sup>

#### 4.基礎建設

謝濬澤〈從打狗到高雄：日治時期高雄港的興築與管理(1895-1945)〉，嘗試探討日治時期高雄港興築後，如何改變高雄當地工商的發展。作者指出，港口管理制度所的影響和臺灣工業化政策的推展，使得高雄地區逐漸成為臺灣重化工業與軍需工業的核心。港口的興築與管理政策固然重要，但高雄地區的物產與資源更是當地發展的基礎。不過，港口政策僅作為經濟發展的基礎建設，作者也不應忽略市場面的導向問題。

#### 5.對外援助

陳思賢〈中華民國與沙烏地阿拉伯的農業技術合作(1965-1975)〉，探討戰後臺灣對沙國實行農業技術合作起因、過程與影響。駐沙農耕隊為臺灣在中東地區首支官派的團體，該國也為中華民國在退出聯合國前後，唯二提出農業技術合作的國家，並成為中華民國技術援外史上，歷時最久的技術團隊。<sup>48</sup>

#### 6.經濟治理

陳思宇〈冷戰、國家建設與治理技術的轉變：戰後臺灣宏觀經濟治理體制的形成(1949-1973)〉本研究旨在藉由敘述一種新型態「經濟行政體制」形成的曲折故事，重新拼湊1949年以降臺灣「國家體制建設(State-building)」的歷史圖像；另一方面，則跳脫偏重於「戰爭」的「軍事衝突」層面，或僅視「戰爭」為一種「國際關係」形式的既有研究框架，運用「組織與制度」演化的研究取徑，進而反思「全球冷戰(the cold war)」與中國內戰(以下簡稱內戰)的歷史進程與內在意涵。具體而言，本研究將圍繞「戰爭」與「國家建設」二者的相互關係，採取多元的思考路線，組織歷史演變的「敘事情節」，嘗試說明在中國大陸遭逢軍事潰敗幾近崩解的中華民國政府，如何在混亂中遷移至臺灣這個原屬日本殖民地的邊陲島嶼，甚至在美國霸權的各種支援下，通過「模仿－移植」美式行政治理的思維與技術，展開一系列國家建設工程。而由一個原為統治中國廣闊領土與眾多人口而建構的龐大機器，演化成一個以治理島國臺灣為目標，並且融入美國全球體系的「新」國家。<sup>49</sup>

蔡育軒〈地方治理與制度變遷：以臺灣三大都市公車制度為例〉透過威權與民主不同階段的地方治理型態，探討對於公共服務制度所造成的影響。除此之外，本研究也從歷史制度論的層面，探討此三都市為何會發展出此三種不同型態的公車制

<sup>47</sup> 張孟珠、楊文山、莊英章，〈日治時期新竹地區妾婚現象的歷史人口學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3：2（2011.6），頁117-158。

<sup>48</sup> 陳思賢，〈中華民國與沙烏地阿拉伯的農業技術合作(1965-197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sup>49</sup> 陳思宇，〈冷戰、國家建設與治理技術的轉變：戰後臺灣宏觀經濟治理體制的形成（1949-1973）〉，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1。

度，藉此提供日後其他都市公車政策之借鏡。<sup>50</sup>

## 7.其他

老川慶喜、須永德武、谷城秀吉所編《殖民地臺灣の經濟と社會》書，由臺日兩國學者共同執筆，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視野來看殖民地研究。在章節安排上，主要分成經濟發展與社會資本、企業活動的展開、帝國日本與臺灣社會的變化。<sup>51</sup>

羅世松〈鐵路局臺北機廠歷史與其鐵道產業文化資產之基礎研究〉，以臺北機廠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對臺灣鐵道產業各時期之歷史、技術養成與檢修體系之沿革進行闡述，並對該廠所存各項有形與無形文化資產進行定位、建議。<sup>52</sup>

賴建寰〈1989年遠化五月罷工文宣中的論述策略〉，運用特定罷工事件的文宣，從產業民主性、集體的團結性等角度，詮釋勞工運動的意義。<sup>53</sup>

## (五)科技與交通

吳政憲《通訊與社會——日治時期臺灣「警察專用電話」系統的建立(1895-1945)》中，除探討日治時期警察專用電話系統的沿革外，並以「臺海戰役」、「五年理蕃計畫」為例，詳實地說明警用電話如何運用在地方治理。另外，作者也說明電務工手所扮演的角色。作者主要欲從此書的探討顯現出日治時期先前的電話科技使用如何影響臺灣的社會，並對其時代意義進行闡述。<sup>54</sup>

曾立維〈殖民地臺灣電報、電話通訊網的建立及使用數量分析〉一文，以宏觀的角度討論日治時期臺灣的電報、電話通訊網的建立，並對使用數量加以分析。研究結果發現，日治時期大部分時間，電報與電話事業多依附在郵便局下進行。另外，日治時期電話交換網的分佈至日治後期為止仍未超過電報網。<sup>55</sup> 然後，作者後續或可進一步關注軍用通信如軍用無線電所發揮的功能。

蔡龍保〈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的技術人力之招募：以土地調查事業為例〉是以詳實的史料，剖析日本治臺初期臺灣總督府土地調查事業所招募人力來源，結論發現人才與軍方關係十分密切。此外，臺灣總督府除動員自身人才轉任、訓練國語傳習所學生，並動員總督府相關的技術官僚擔任教官，協助培訓人員。但這些技術人員在調查事業結束後的留任比例並不高。藉由此研究，得以瞭解技手階層在殖民地統治所扮演的重要角色。<sup>56</sup>

<sup>50</sup> 蔡育軒，〈地方治理與制度變遷：以臺灣三大都市公車制度為例〉，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sup>51</sup> 老川慶喜等編，《殖民地臺灣の經濟と社会》，東京：日本經濟評論社，2011。

<sup>52</sup> 羅世松，〈鐵路局臺北機廠歷史與其鐵道產業文化資產之基礎研究〉，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sup>53</sup> 賴建寰，〈1989年遠化五月罷工文宣中的論述策略〉，《臺灣風物》，61：4（2011.12），頁117-150。

<sup>54</sup> 吳政憲《通訊與社會-日治時期臺灣「警察專用電話」系統的建立(1895-1945)》，臺北：稻鄉出版社，2011。

<sup>55</sup> 曾立維，〈殖民地臺灣電報、電話通訊網的建立及使用數量分析〉，川島松、松永正義、陳翠蓮編，《跨域青年學者臺灣史研究第四集》，臺北：稻鄉出版社，2011，頁155-210。

<sup>56</sup> 蔡龍保，〈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的技術人力之招募：以土地調查事業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陳冠任所著〈盟軍總部與中日漁權爭議〉，從國際外交的觀點分析盟軍佔領日本期的漁場劃分。當時盟軍為解決日本糧食不足問題，進而劃定麥克阿瑟線(MacArthur Line)，允許日本漁民在特定海域內從事作業。然而，該線的劃分方式卻使得盟總與鄰近日本的各國爭議不斷，但盟總依舊擅自擴大日本漁區。為此，中華民國制定了國內法進行抵制，最終中華民國在國際情勢的考量之下，向盟總讓步。<sup>57</sup> 藉由此文的論說，體現出戰後中華民國在國際政治與外交的重要性，有時將凌駕經濟利益。

陳繼善〈百年來中華民國空中交通運輸事業的回顧(1912-2011)〉，先對中國大陸時期的中華民國航空業發展進行回顧，其次再對日治與戰後臺灣航空業的發展予以介紹。<sup>58</sup>

蔡龍保〈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的鐵路發展政策(1895-1945)〉，提出臺灣總督府的鐵路發展，分為建主改從時期(1895-1926)、改良時期(1927-1936)、戰爭時期(1937-1945)。就鐵路的功能而論，由最初滿足軍方的需求轉為經濟考量的開發，其後在戰爭時期則配合國策需求發展。<sup>59</sup>

蘇昭旭〈阿里山森林鐵路車輛發展史〉，有別於一般鐵道研究以鐵路發展對社會經濟與運輸的影響進行討論，反倒是對不同時期使用的蒸汽火車與退役後的保存狀況進行說明。<sup>60</sup> 但本文主要為對一般大眾介紹之性質，故較不注重一次性史料引用。

李凱騏〈戰後臺灣鐵路管理局臺東線研究——以《花蓮管理處處報》為考察中心(1956-1969)〉，探討 1950-1960 年代臺鐵臺東線歷史，並從臺東線在其設備、與花東公路的互動及對花東地區的經濟影響做探討。<sup>61</sup>

## (六)貨幣與金融

陳哲三〈臺灣清代契約文書中的銀幣及其相關問題〉，對清代臺灣古文書契約中提及的銀幣進行統計與分析，以瞭解清代各時期當時流通於臺灣的外國貨幣種類、流通期間與地域差異。研究結果發現，臺灣使用銀幣的時間始於南部，其次才擴展到中部北部，此一現象或與臺灣開發由南而北具有密切關聯。<sup>62</sup>

林寶安《金融與社會——戰後臺灣金融體系與信用的演進》，從社會學觀點分析金融體系與信用演進的歷史脈絡。文中除探討威權時期的金融秩序與影響外，也對新銀行開放、政策期票信用的發展、分期付款買賣的形成、消費金融的演變進行論述。然而，本書是以社會學的角度作為出發，故著重於社會經濟意義的詮釋，與歷史學

35 期，2011，頁 75-144。

<sup>57</sup> 陳冠任，〈盟軍總部與中日漁權爭議(1945~1952)〉，《國史館館刊》，27 (2011.3)，頁 47-110。

<sup>58</sup> 陳繼善，〈百年來中華民國空中交通運輸事業的回顧(1912-2011)〉，《政大歷史學報》，頁 221-244

<sup>59</sup> 蔡龍保，〈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的鐵路發展政策 1895~1945〉，《檔案季刊》，10：3 (2011.9)，頁 50-69。

<sup>60</sup> 蘇昭旭，〈阿里山森林鐵路車輛發展史〉，《檔案季刊》，10：2 (2011.6)，頁 4-27。

<sup>61</sup> 李凱騏，〈戰後臺灣鐵路管理局臺東線研究——以《花蓮管理處處報》為考察中心(1956~1969)〉，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1。

<sup>62</sup> 陳哲三，〈臺灣清代契約文書中的銀幣及其相關問題〉，《逢甲人文社會學報》，22 (2011.6)，頁 101-137。

研究偏重史料的方式不同。<sup>63</sup>

吳敏政〈臺灣股市歷史上的趨勢轉折——以母子型態為例〉，試圖以1989-2009年臺灣的股價趨勢，探討趨勢的轉折有何規律，並以技術分析中的陰陽線母子型態為題，做為討論之依據。<sup>64</sup>

蔡惠雯〈日治時期臺灣北部民間借貸利率研究——以《新屋鄉葉氏嘗簿》為主的解讀與分析〉，整理1901至1943年間新屋地區民間借貸利率的變動趨勢，並與官方的利率數據進行比較。研究結果發現，不論是官方或民間的長期借貸利率，趨勢均為一致。<sup>65</sup>

魏占峯〈從基層金融到商業銀行——「板信」之研究（1957-1997年）〉，對戰後新成立的板橋鎮信用合作社的發展進行討論，探討該地基層金融的發展與地方社會、經濟的因果關係。<sup>66</sup>

吳芸臻〈臺灣金融監理制度變革之政治經濟分析，1949-2011〉，提出1949年到2011年間，金融監理思維呈現「嚴格管制」、「去管制」以及「再管制」等三階段轉變，對不同時期金融監理制度發生之因果關係進行論述。<sup>67</sup>

## (七)地域與經濟

邱曉君〈林業開發與羅東社會經濟的發展〉探討太平山如何在臺灣總督府展開林野調查與整理事業下進行開發。透過分析羅東木材業者之成立時間、分布地點、經營型態、人口變動等因素，探討太平山林業開發與羅東產業經濟發展間的關係。<sup>68</sup>

洪雅芳〈通霄雕刻產業之研究〉，指出戰後福州派的師徒傳承方式，為日後通霄地區的雕刻產業奠下優秀的人才基礎。大致上，通霄地區的雕刻以人物、佛像見長，與三義的天然花鳥、動物木雕不同。其次，韓戰美軍駐臺以及日本來臺觀光，讓臺灣的雕刻業由原本的內銷轉向外銷市場。但當國際需求衰退時，直接衝擊到的就是國內的雕刻產業，通霄地區的雕刻產業逐漸走向衰退。<sup>69</sup>

許蕙玟〈交通、族群與埔里地區雜貨店經營之變遷（1814-1945）〉一文，主要在交通與族群兩大軸線上，探討清代至日治時期埔里地區雜貨店的變遷，試圖構築雜貨商進入埔里地區的商業活動與經營面貌。<sup>70</sup>

<sup>63</sup> 林寶安，《金融與社會：戰後臺灣金融體系與信用的演進》，臺北：巨流，2011。

<sup>64</sup> 吳敏政，〈臺灣股市歷史上的趨勢轉折——以母子型態為例〉，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1。

<sup>65</sup> 蔡惠雯，〈日治時期臺灣北部民間借貸利率研究——以《新屋鄉葉氏嘗簿》為主的解讀與分析〉，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1。

<sup>66</sup> 魏占峯，〈從基層金融到商業銀行——「板信」之研究（1957-1997年）〉，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sup>67</sup> 吳芸臻，〈臺灣金融監理制度變革之政治經濟分析，1949-2011〉，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sup>68</sup> 邱曉君，〈林業開發與羅東社會經濟的發展〉，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sup>69</sup> 洪雅芳，〈通霄雕刻產業之研究〉，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1。

<sup>70</sup> 許蕙玟，〈交通、族群與埔里地區雜貨店經營之變遷（1814-1945）〉，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1。

楊惠瑛〈清代至日治時期梧棲港街的發展與貿易變遷〉嘗試從市場圈、貿易網絡及商人活動變化等面向，建構清代至日治時期梧棲「港街」的發展實態，解析傳統港街如何在政權變革下變化。<sup>71</sup>

趙文榮〈日治時期臺南州區之糖業與地方社會(1895-1945)〉係探討日治時期臺灣重要產糖之臺南州區一帶的糖業與地方社會的關係。從各項指標來看，該地之蔗田栽種面積、甘蔗收成產量、傳統糖廊數、改良糖廊家數、新式製糖廠數目、及新式製糖軌道的分佈與哩程數都冠居全臺之首。作者透過此文論證，新式製糖業對地方政治、經濟、社會、交通皆造成影響，其重要性不容忽視。<sup>72</sup>

蔡雅婷〈高雄縣大樹鄉農會與當地農業發展之關係(1953-2009)〉，透過對單一鄉鎮的研究，瞭解該地農會對地方農業的影響。結果指出，當地農會由過去作為政府政策的協力者，轉為策進地方農業特色發展的推手。在業務面上，則由傳統的重視糧食增產，轉為產銷並重，並朝向多元化發展的樣式邁進。<sup>73</sup>

蔡順來〈地方產業與家族移民——以壽豐立川漁場蔡氏家族為例〉，以1960年代蔡氏家族為例，對其在島內的移民與拓殖進行討論。研究結果發現，該家族遷移所受的推力是為天災蹂躪導致謀生不易而遠赴他鄉，所受拉力乃為就業機會與所得。在經營方式上，也從最初僅注重生產，演進到改善品質、品牌等行銷面向。<sup>74</sup>

國永美智子〈戰後八重山的鳳梨產業與臺灣「女工」〉，有別於過去多從文學角度研究在沖繩的臺灣女工，該文則以沖繩當地的鳳梨工廠為焦點，關注臺灣女工在沖繩的具體生活與工作實況。<sup>75</sup>

黃郁舒〈家族、茶廠與地方派系——以苗栗縣獅潭鄉北四村為例之探討〉，以清末開墾獅潭家族為研究起點，探究地方家族發展、地方產業、地方派系之間的面貌。<sup>76</sup>

黃詩驊〈臺南新營地區之產業發展及其聚落變遷(1662-1845)〉，探討新營城市如何崛起，重現20世紀中葉前新營地區的產業發展及其聚落變遷。<sup>77</sup>

楊秋賢〈水利開發與地區發展互動之研究——以頭前溪北岸九芎林為例(1775-1945)〉，以區域性土地開墾與水利的興築，強調「水資源」的利用性，對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依靠度，如何帶動地區農業、商業的經濟發展。<sup>78</sup>

吳正偉〈從盤山過嶺到丟丟銅仔——臺灣東北角的交通路線變遷與區域特性(1783-1926)〉，奠基於東北角位居臺北盆地與蘭陽平原區位的通過性，試圖探討該

<sup>71</sup> 楊惠瑛，〈清代至日治時期梧棲港街的發展與貿易變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1。

<sup>72</sup> 趙文榮，〈日治時期臺南州區之糖業與地方社會(1895-1945)〉，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1。

<sup>73</sup> 蔡雅婷，〈高雄縣大樹鄉農會與當地農業發展之關係(1953~2009)〉，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1。

<sup>74</sup> 蔡順來，〈地方產業與家族移民——以壽豐立川漁場蔡氏家族為例〉，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暨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sup>75</sup> 國永美智子，〈戰後八重山的鳳梨產業與臺灣「女工」〉，淡江大學亞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sup>76</sup> 黃郁舒，〈家族、茶廠與地方派系：以苗栗縣獅潭鄉北四村為例之探討〉，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碩士論文，2011。

<sup>77</sup> 黃詩驊，〈臺南新營地區之產業發展及其聚落變遷(1662-1845)〉，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sup>78</sup> 楊秋賢，〈水利開發與地區發展互動之研究：以頭前溪北岸九芎林為例(1775-1945)〉，國立交通大學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碩士論文，2011。

地獨特的區域特性變遷。<sup>79</sup>

曾臺輔〈日治時期文山郡保安林之經營〉，透過日治時期文山郡保安林之經營過程，探討文山郡產業活動與保安林經營之關係。<sup>80</sup>

張減婷〈太平山林場與森林鐵路對蘭陽地區城鄉發展影響以溪南地區為例〉對宜蘭的發展因受蘭陽溪阻隔的影響，使得溪南的發展較溪北緩慢之現象進行討論。<sup>81</sup>

許歆妮〈日治時期臺灣新式製糖工廠組成與都市發展——以虎尾、溪湖及新營為例〉，本研究以形狀文法用於分析規劃設計邏輯，找出隱含之模式與程序，再配合文獻論述，了解配置在糖廠規劃設計時所扮演的角色、形狀文法寫作之分類與段落、以及各地區比較製糖產業之出現、興衰對於都市發展的影響，展現糖廠之於地方文化與城鎮發展重要性之意涵。<sup>82</sup>

張智雅〈清代北臺大龍峒和大稻埕之社會經濟史研究〉一文，對於清代同安縣人渡過臺灣海峽來到北臺灣，先居於大龍峒，後再遷入大稻埕之過程進行考察，並探討與社會經濟之互動過程。<sup>83</sup>

游明潔〈新竹金山面聚落產業變遷之研究〉一文，旨在探討自早起至今日金山面聚落地方環境與居民生計活動之間的關係，由自然環境、人口、技術、組織、文化與外部環境等面向，探討造成金山面地區從傳統產業、工業化到高科技產業變遷的過程。<sup>84</sup>

徐幸君〈戰後臺灣北部客家茶產業經營性格〉，透過對北部茶產業進行討論，提出客家族群經濟中的「保守」性格，並不是與生俱來的特質。研究指出，客家籍業者是在有限資源與環境中所展現出的經濟行為特質，而在經營上的保守性格，反應出其在社會階級的邊陲位置。<sup>85</sup>

陸俊翰〈臺北瑠公圳發展變遷之研究〉，著重探討瑠公圳自開闢以來各時期的轉化歷程，並在臺灣都市發展之框架下探討臺北市都市發展對於瑠公圳的影響。又，再對瑠公圳現階段所面臨的課題加以分析，並提出解決策略。<sup>86</sup>

### 三、結論

<sup>79</sup> 吳正偉，〈從盤山過嶺到丟丟銅仔：臺灣東北角的交通路線變遷與區域特性（1783-1926）〉，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sup>80</sup> 曾臺輔，〈日治時期文山郡保安林之經營〉，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sup>81</sup> 張減婷，〈太平山林場與森林鐵路對蘭陽地區城鄉發展影響-以溪南地區為例〉，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sup>82</sup> 許歆妮，〈日治時期臺灣新式製糖工廠組成與都市發展——以虎尾、溪湖及新營為例〉，逢甲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sup>83</sup> 張智雅，〈清代北臺大龍峒和大稻埕之社會經濟史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碩士論文，2011。

<sup>84</sup> 游明潔，〈新竹金山面聚落產業變遷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sup>85</sup> 徐幸君，〈戰後臺灣北部客家茶產業經營性格〉，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sup>86</sup> 陸俊翰，〈臺北瑠公圳發展變遷之研究〉，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系碩士論文，2011。

近年來，經濟史相關專書中，以產業史的研究最為豐碩。其中，產業史研究又集中在第二級產業。就經濟史的角度來看，攸關生產的第二級產業固然重要，但以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級產業研究仍極度欠缺。比方說，所謂的「產銷」在關注產品的製造之外，也必須注意銷售商品之課題，故對近現代臺灣經濟史中的流通業研究可說有待擴展。

然而，研究流通業相關議題仍存在許多困難。舉例來說，日治時期臺灣的流通業有三井物產、三菱商事等支配島內重要物資的上游銷售，但下游小賣商則散居各地，且經營者多屬地方資本。若要瞭解這些下游小賣商的情形，不僅資料收集困難度高，對於經營層面之理解與解讀，因涉及區域的社經結構與商業網絡，亦有困難。

另一方面，近年來亦有不少以經濟史為主題的半學術性、圖文並茂之著作，或是接受政府委託計畫出版之專書。有些成果固然紮實地援引第一手資料作為撰寫素材，但亦有著作多援引二次性資料，且未對史實進行深入考證之情形，成果可說是良莠不齊。在家族與產業相關論文中，除了五大家族的研究所，若能開發其他家族史料，將有助於對臺灣社經發展下的資本積累有所瞭解。

有關經濟政策與制度上的討論中，近年來不少論著亦著墨於戰後的經濟政策。早期重要政策的形成，會先經每週三召開的國民黨中常會討論達成初步決議後，再送交每週四召開的行政院會議討論。由此可見，早期臺灣在國民黨政權的一黨獨大下，諸多政策並非由政府單方面即可達成共識。因此，吾人必須重新檢視國民黨的經濟政策觀，並將政府決策置於國民黨與中華民國政府雙元體制下討論，或可釐清戰後政府實施各項政策之脈絡。

對於戰後土地政策的討論方面，在過去的通說中，多聲稱政府在臺灣推動的土地改革對臺灣推動工業化發展與加速資金流通帶來重大貢獻。本人雖不否認政府由上而下地實施土地改革，確實瓦解了「地主—佃農」階層。不過，對於臺灣農業的長遠發展而言，或許也造成農業零細化，並抑制發展規模經濟的粗放農業之潛在可能。換句話說，土地改革對臺灣農業所帶來的各項衝擊，尚也必要進行更深層的解析。

在商業活動相關研究方面，人、物、金錢、制度為企業史討論中不可或缺的要害。然而，從事案例研究的過程中，應避免持狹隘的觀點，將討論停滯在對企業的微觀研究上，而是應該放在宏觀的架構下，深入分析企業行為。另外，臺灣自清末開港乃至日本治臺初期，不僅止於貿易型態的改變，許多「在來」的生產樣式，更在「外來」的力量下發生競爭與轉變。

另外，許多碩士論文以區域為中心，探討當地區域與社會經濟發展。關於此一議題的研究，在地的研究者可說具有田野訪問的利基。雖言這些研究論著的品質參差不齊，但某些論文仍有助於瞭解地方的社經發展。

綜而言之，近來在近現代臺灣經濟史的研究成果方面，較缺乏宏觀的討論，也較不注重經濟史之長期發展脈絡及構造問題。未來，研究者或可善用既



有的經濟史研究論著，以此成果為基礎，嘗試提出更大框架的論述。